

【鲁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鲁迅的学术构想与路径

2023年6月3日，北京鲁迅博物馆（北京新文化运动纪念馆）邀请北京大学中文系研究员、长聘副教授，现代文学教研室主任，北京大学现代中国人文研究所副所长王风先生在鲁迅书店举办了题目为“未完成的学者——鲁迅的学术构想与路径”主题演讲活动，承办方为中关村教育基金会和迅鲁文化传媒（北京）有限公司，到场嘉宾40余人，其中北京鲁迅博物馆副馆长姜异新女士和北京鲁迅博物馆研究部副主任秦素银女士等进行了总结性发言。

假如我们在网络搜索引擎上输入“北大中文系”和“王风”这两个关键词，一定可以找到多篇记叙王风其人其事的文章，这些文章大多出自他周围的朋友。当然，在读完这些文字之后，我们也许可以建构出对王风的核心印象——名士风度。

所谓名士，必定落拓不羁、优游岁月，王风花费十几年时间精心整理、校勘全六册《废名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这在旁人看来简直是“不务正业”（现代学术评价体系只认可古籍整理），结果书出版后，获得学界同行的一片赞誉，并为整理、编辑现代作家全集提供了范例。而对于“名士”一说，王风其实很不愿意被这样标注，他觉得也就是做了些愿意做的事情。



“学者鲁迅”是新世纪鲁迅研究的一个渐成前沿的学术话题，是富于诱惑又颇具挑战的论域，尚未开掘以及未能深挖的研究空间仍相当大。诚如董炳月 2016 年 9 月于“鲁迅研究在二十一世纪”学术研讨会上所言：“学者”是鲁迅的常态，是“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鲁迅的基础；鲁迅的学问未能得到充分研究，“回到鲁迅”的工作仍未做完，“关于鲁迅，遗漏、未知的东西还是很多”，应系统研究鲁迅在中国近现代知识体系当中的位置。

其实早在 20 世纪 30 年代，蔡元培、胡适、周作人、赵景深和郑振铎等一些学者，对于鲁迅的学术成就都给予特别肯定，只是这种肯定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中被有意无意忽略而已。更值得注意的是，当时学术界对鲁迅的学术研究成果（除了其中国古代小说研究外）基本上

持忽视或置之不理态度。这一方面与鲁迅的文学创作光芒过于耀眼遮蔽了其学术研究成果有关，一方面也是由于 1949 年前的中国学术界大师频出，成果层出不穷；而鲁迅后期将主要精力投入文学创作，较少介入学术活动，其学术成就不能获得应有的评价也就不难理解。



蔡元培与鲁迅的交往以及他对鲁迅一生的影响，是很值得记叙的。郭沫若曾说：“影响到鲁迅生活颇深的人应该推数蔡元培吧！这位有名的自由主义者，对于中国的文化教育界贡献相当大，而他对于鲁迅始终是刮目相看的。鲁迅进教育部乃至进入北京教育界都是由于蔡元培的援引。一直到鲁迅的病歿，蔡元培是尽了没世不渝的友谊。”

蔡元培注重美育，意在提高国民精神境界，甚至提出“以美育代替宗教”的主张。鲁迅积极响应，在《拟播布美术意见书》中说：“顾实则美术诚谛，固在发扬真美，以娱人情，比其见利致用，乃不期之成果。”蔡元培倡议开办“北京夏期讲演会”，以“从事学问，阐发理

术，宏深造诣”为宗旨，并指派鲁迅讲授《美术略论》，鲁迅欣然应命，出力颇多。蔡元培被迫辞职后，鲁迅与许寿裳前往慰问蔡元培，还为蔡元培举办饯别宴会。而当新任总长把“美育”删除时，鲁迅在日记中写道：“闻临时教育会议竟删去美育，此种豚犬，可怜，可怜！”

鲁迅

《人之历史》

《科学史教篇》

《文化偏至论》

《摩罗诗力说》

《破恶声论》

周作人

《论文章之使命暨其意义因及近时论文之失》

《哀弦篇》

鲁迅抄古碑、搜集金石拓本、辑录和校勘古书，也引起有同好的蔡元培的注意。他们之间常有切磋和交流。蔡元培将自己收藏的《赞三宝福业碑》《高归彦造像》《丰乐七帝二寺邑义等造像》和《苏轼等仿像老题记》拓片赠送给鲁迅。他们还书信往还，讨论汉代石刻。鲁迅在致蔡元培的信中说：“汉石刻之人首蛇身像，就树人所收拓本觅之，除武梁祠画像外，亦殊不多，盖此画似多刻于顶层，故在残石中颇难覩也。”鲁迅注重汉碑的图案，并竭力倡导将它们运用到新兴木刻和书籍装帧艺术中。蔡元培深表赞同，视为独创：“金石学为自宋以来较发展之学，而未有注意于汉碑之图案者，鲁迅先生独注意于此项材料之搜罗，推而至于《引玉集》《木刻纪程》《北平笺谱》等等，均为旧时代的考据家、赏鉴家所未曾著手。”

- 一，会稽郡故书杂集。
- 二，谢承后汉书（未刊）。
- 三，古小说钩沉（未刊）。
- 四，小说旧闻钞。
- 五，唐宋传奇集。
- 六，中国小说史。
- 七，嵇康集（未刊）。
- 八，岭表录异（未刊）。
- 九，汉画石刻（未完成）。

《北平笺谱》《十竹斋笺谱》（连环画、版画）

1920年8月2日，鲁迅收到蔡元培的聘书，聘请他担任北大讲师。按当时学校规定，兼职者只能任讲师，而不能任教授。鲁迅担任讲师，并不意味着他的水平低。鲁迅讲授的中国小说史，深深吸引着同学们。冯至先生回忆说，鲁迅的课，“在引人入胜、娓娓动听的语言中蕴蓄着精辟的见解，闪烁着智慧的光芒。”鲁迅还在讲义的基础上完成《中国小说史略》，是中国文学史研究方面的开创之作。

特别值得大书特书的是，校长蔡元培知道鲁迅有相应的美学知识与版画创作技能，便委托其为北大设计校徽。1917年8月7日，鲁迅日记记：“寄蔡先生信，并所拟大学徽章，”迈过百多年的历史风尘，这枚鲁迅设计的校徽，至今仍在北大师生的胸前佩戴。其寓意为所有教职员工团结一心像一个巨人（下面的人字）一样教诲服务于所有的学生，所有学生应该成为可以托付后背的伙伴。

《新青年》时代，鲁迅为“战士”、“朋友”敲边鼓，其时周边并无所谓“青年”。而兄弟失和之后，北京《语丝》时期，固然他是重要作者，但这一平台实际由周作人主持，本质上他还是“客员”。鲁迅

另开了场域，与“青年”为伍。如所参与的《莽原》、《未名》、《浅草》、《狂飙》，以及“未名丛书”、“乌合丛书”等等。

不过“于己”抑或“于人”，鲁迅终究一直异路。比如，1925年12月13日《我观北大》云：“凡活的而且在生长者，总有着希望的前途。”翌日即14日，写《这样的战士》，文本中无穷尽“举起了投枪”的，是奋战于毫无希望的“无物之阵”，注定必将败于“无物之物”的战士。这看似“矛盾”，实乃鲁迅的“两面”。“我所说的话，常与所想的不同……我为自己和为别人的设想，是两样的”。因此类似《野草》的讨论，不宜过于对应现实。引用鲁迅其他类型的作品，也需十分谨慎。否则必将方枘圆凿，扞格不入。

与其说是金心异的说服，倒更像是自我说服。鲁迅由此再度发动。但《新青年》对他而言，并不是《新生》的重新实现。按周作人的说法，他们只是“客员”而已。《狂人日记》等作品，消极说是“敷衍朋友们的嘱托”，积极点说，则是“叫喊于生人中”，“聊以慰藉那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在这背后，仍然是“我之必无”的鲁迅。“我那时对于‘文学革命’，其实并没有怎样的热情”。而“在《药》的瑜儿的坟上平空添上一个花环，在《明天》里也不叙单四嫂子竟没有做到看见儿子的梦”，正与他的“确信”相反对。“平空添上”的“花环”，“不叙”单四嫂子没在梦里见到儿子，都只是策略上的“不恤用了曲笔”，或“故意的隐瞒”，所谓“删削些黑暗，装点些欢容”。



所谓“新文学”，一个基本的判断就是以白话代文言，但问题是白话至少在唐宋时期就有了，到明清到近代，一直都有，那凭什么说白话代文言是新文学成立的一个标志呢？再如，鲁迅一出手的《狂人日记》等等，所达到的水平，一般总归为他的天才。

鲁迅的《狂人日记》为什么一出手就会写出那么高的水平？在我看来，最主要的原因，是周氏兄弟把他们晚清时期文言的实践，这个时候移用到白话中来了。所以他们的白话跟以往的也不一样，晚清时他们根本没接触过当时的白话，不管是白话小说的语言还是白话报的语言，而是直接从他们自己改造的文言中“转写”过来。再加上不同于陈独秀、胡适、刘半农他们接受的是浪漫主义、现实主义，顶多到自然主义的影响，而是象征主义以次当时最新的文学潮流。这些都促使他们一出手就把新文学的水平提得很高。

此外，段落、标点这些西方书写形式的引入，是造就现代书写语言的根本要素，也是汉语现代书写语言的根本特征。晚清时周氏兄弟

的直译，是将书写形式也照原样翻译了过来，这造就了前所未有的文言。而到文学革命时期，他们改行白话，这些书写形式也全面移用到白话，又造就了一种前所未有的白话。这也就是我们现在所书写的语言的基础，文本面貌彻底变了，写作思维也彻底变了。如果没有分段的话，《狂人日记》几乎不能成立，分段是《狂人日记》最大的修辞手段。



鲁迅曾说，“为着自己”的《野草》，“此后做不做很难说，大约是不见得再做了”。不过他逝世时留下的诸多未完工作中，有一本《夜记》，多少算是“再做了”。据许广平的介绍，至少《半夏小集》、“这也是生活”、《死》、《女吊》这四篇，一定是其中的构成。而二十年代末，甫到上海前后，鲁迅就曾有过“夜记”的计划，并写过四篇半，也是没有完成的计划。完整留下的只有 1927 年的《怎么写》和《在钟楼上》，写的是在厦门和广州时的情形。那时的他“新来而且灰色”，“委实有些舒服”。孤独而犹疑，只能在“夜”中思索和徜徉。

学术—翻译—创作—杂文

鲁迅先生本受清代学者的濡染，所以他杂集会稽郡故书，校“嵇康集”，辑谢承“后汉书”，编汉碑帖、六朝墓志目录、六朝造像目录等，完全用清儒家法。惟彼又深研科学，酷爱美术，故不为清儒所囿，而又有他方面的发展，例如科学小说的翻译，“中国小说史略”，“小说旧闻钞”，“唐宋传奇集”等，已打破清儒轻视小说之习惯；又金石学为自宋以来较发展之学，而未有注意于汉碑之图案者，鲁迅先生独注意于此项材料之搜罗；推而至于“引玉集”，“木刻纪程”，“北平笺谱”等等，均为旧时代的考据家赏鉴家所未曾著手。

陈寅恪在评述陶渊明时讲到：“古今论陶渊明之文学者众，论其思想者较少。”套用到鲁迅身上，大致也可以描述为，“古今论鲁迅之文学、思想者甚众，论其学术者较少。”历来，鲁迅是作为文学家、思想家被广大的受众所熟知和肯定，这却在一定程度上遮掩了作为“学术大师”的鲁迅的光芒。仅就著述数量，鲁迅的学术成果确实不多，但仅凭《中国小说史略》这样开创性的成果，已经可以确立他在20世纪中国学术史上的地位，对此不应有任何疑义，而且鲁迅在当时就已获得胡适、蔡元培等人的高度赞美。

鲁迅一生的工作，已被学界反复描述。其主要身份被定位在文学领域，而思想的独立深刻，与投身革命永不休止的热望，更构建了他的人格形象。不过，这些为人熟知的面向，也遮蔽了他在人生道路上的自我设计。民初鲁迅钞古碑与辑佚古小说，通常被解释为失望下的沉潜，或重新出发的原点，实则忽视了他学术方面的全体规划。由于加入《新青年》集团，以及后来时势的推动，使得他一生不能已于言。

因而尽管部分学术工作得以呈现，但他的总体学术目标并未完全实现。
作为学者的鲁迅，终于没有完成。

